

編者的話

跨越國界的愛，是以在各城市和各國被稱為「人際友誼」的關係為基礎。社會中真誠的人際友誼是實現真正普世精神的條件。這並非虛假的普世精神，亦即因無法忍受和不愛自己的人民，而不斷外遊。要是輕蔑自己人民，往往會將社會分為上等和次等的階層、擁有較多和較少尊嚴的人、享有較多和較少權利的人。如此，他們否定每一個人都有其地位。（《眾位弟兄》99）

承認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弟兄姊妹，並尋求容納每一個人的人際友愛，都不是虛幻的理想。這要求我們立定決心，尋找可實現此事的有效途徑。為此作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崇高的愛德行為。雖然個人可以說明有需要的人，但當他與人聯手，為眾人開展兄弟情誼和正義的社會進程，他是在實踐「更廣闊的愛德，政治的愛德。」這是致力建立一個以社會愛德為靈魂的社會政治秩序。我再次邀請大家重新認清政治是什麼。政治「仍是一種崇高的召叫和愛德的最高表現之一，只要它以尋求公益為主。」（《眾位弟兄》180）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教宗方濟各的《眾位弟兄》通諭像《願祢受讚頌》通諭一樣，向整個世界發出呼籲，

而不僅僅是向天主教的羣體。¹ 它讓我們想起了中國文化界流行的「暮鼓晨鐘」的警示，提醒世界需要祈禱和尋求生活中的純潔。2020年10月，當人類對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每天造成的生命損失感到震驚時，世界不同的地方也面對當地的挑戰，包括美國總統大選。香港經歷了「烏雲」的掩蓋，人們正在反思前一年的挑戰。這是一個受傷的世界。教宗作為提供牧靈關懷的受傷治療師的領袖之一，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手足情誼和人際友愛的願景被設定為未來的希望。

通諭發表後不久，筆者應邀在天主教原道交流學會和劍橋神學聯合會（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瑪嘉烈·博福特神學院（Margaret Beaufort Institute of Theology）聯合舉辦的網上研討會上發言。另外兩位演講者包括一位當地哲學學者和一位社會心理學學者。這份通諭被視為對香港的情況有相當的啟發性，引導香港可以從教宗全球化靈性的角度反思他們最近的經歷。教宗這份新的通諭以《福音的喜樂》和《願祢受讚頌》為基礎聯合成三部曲。遵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精神，教宗方濟各正在帶領教會進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作為一位全球化世界的教宗，他的教導涉及當今世界生活的不同方面。為了正確理解他的講道意義，在社會訓導的領域，也需要從全球和本地的不同角度進行研究。

筆者很榮幸受邀擔任這期《鼎》的客座編輯，以慶祝

1 教宗方濟各，《眾位弟兄》通諭 — 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2020年，<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1PopeMeessage/3Encyclical/眾位弟兄.pdf>

《眾位弟兄》通諭出版兩周年。來自英國、美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撰稿人從各自的背景和角度撰寫。筆者也在本期特刊中貢獻了自己的文章，並分享了觀點。筆者非常感謝所有作者的熱情回應，特別是考慮到他們對自己的專業服務沉重的工作。馬西莫·法吉奧利（Massimo Faggioli）是美國一位著名的神學家，研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和教宗方濟各。他以精湛的筆觸，在新興的全球性教會面臨的挑戰和教宗的動態的更廣泛背景下，對通諭進行了高度濃縮的回顧。通諭是「邊緣教宗」（法吉奧利對教宗方濟各的描述）走向全球性天主教的見證和里程碑。教宗聞名的創新亦引來爭議。在法吉奧利的結語中，他把《鼎》出版這一期特刊所做的努力放置於通諭願景的背景下：

教宗方濟各對西方模式的批評變得更加艱巨，同時，鑒於天主教會，特別是梵蒂岡外交在 2022 年在歐洲和亞洲再次開始面臨的形勢，比通諭出版時更及時。現在有必要開始第二階段的接待《眾位弟兄》，而《鼎》這期特刊是一個非常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這是對教宗的主要文獻進行反思的新進程。

來自大西洋彼岸的彼得·庫格蘭（Peter Coughlan）擁有為梵蒂岡服務的第一手經驗，他對通諭進行了全面瞭解，指出了其主題，旨在展示實現兄弟情誼和發展社會關係的道路。他提醒讀者，人們渴望普遍的兄弟情誼的核心使命是：「他說，讓我們夢想成一個單一的人類大家庭，作為同一個地球的孩子，這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呂大樂在確定了通諭總體背景進行反思的之後，從社

會學的角度出發，討論了通諭的制度基礎。他概述了當代社會的歷史演變，確定了當今世界面臨的挑戰。他認為《眾位弟兄》回應了對當代現狀和對社會環境的評估。在這前提下，他繼續追問如何在當代社會經濟環境中建立兄弟情誼？如何在一個已經失去平衡的機構中表現出關懷、愛和團結？通諭表明，我們需要一種以人性及其價值觀為支撐的文化，以建立共同生活的新社會基礎。

來自 Loyola Marymount 大學的神學家和工程倫理學教授墨禮頌 (Philip Chmielewski) 從對《眾位弟兄》的宏觀評論出發，為工程專業人員和組織帶來了通諭的實際意義。他系統地說明工程專業如何可以透過通諭，獲得通諭中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啟示和指導。

梅蘭妮 - 普雷讓·沙利文 (Melanie-Préjean Sullivan) 承擔跨靈性牧靈導師的服務，分享了通諭在實踐神學的應用方法，可以促進宗教對話的精神，並展示了通諭中蘊含的價值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她的校園工作中播下了種子，這反映了美國大學校園中宗教對話實踐的努力，體現了通諭的精神。

在討論了美國實踐神學的情況之後，特刊將焦點帶到了亞洲和中國。阮美賢 (Mary Yuen) 根據通諭的基本教導，在亞洲教會的背景下，帶出了跨文化和跨宗教對話的討論。憑藉豐富的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經驗，亞洲教會發展了三重對話方法，希望達到和諧的願景。這有望豐富通諭所強調的對話和人類博愛的概念。

從亞洲轉向中國，這是通諭跨文化和跨宗教層面影響

的另一例證。作為盧加勒於 1943 年創立的普世博愛運動的追隨者，甄健湘（Chiaretto Yan）將團結神恩的願景和教宗在《願祢受讚頌》和《眾位弟兄》的教導與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中國政府為了更美好的未來、促進新的全球願景所做的努力聯繫起來。在《眾位弟兄》的指導下，進一步深化跨文化和跨宗教對話的潛力。

黃蕉風是軸心時代中國的重要知識傳統「墨子學」的主要宣導者。墨學在歷史上被邊緣化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在過去二十年間在中國復興，這充分證明墨學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何能夠為促進共同利益提供跨文化的光芒，而它宣揚的兄弟情誼和普遍的愛也應被這份通諭所接受。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是多年來在中國從事哲學和宗教研究教學的著名學者。他就通諭倡導的建立普世博愛社會的努力，以及當代中國正在發展的重視人民集體福祉和社會安全網模式的趨向和分歧，提供了平衡的思考，這比社會中的個人層面更為優先，這正是令手足情誼蓬勃發展所必需的。

作為後記，筆者從宏觀的角度反思通諭的歷史相關性，特別是如何將該份通諭與教宗另外兩部主要文獻，以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精神的繼承一起討論。這個取向正好與法吉奧利（Figgioli）的分析相呼應，反思教宗方濟各如何努力實現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作為全球性教會的願景，以及在中國智慧傳統背景下塑造跨文化和跨宗教對話的新範式。

郭少棠